

贡献。

### 一、容闳与幼童留美

1872年8月11日,30名拖着长辫,身着长袍,脚穿厚底布靴的幼童,在监督陈兰彬的率领下,由上海登轮赴美留学。随后,1873年6月12日,第二批30名幼童由黄胜率领前往美国。1874年9月19日,第三批30名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。1875年10月14日,第四批30名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(其中第二、第四批分别有7名和3名自费生随行)。上述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,开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先河,其倡导、组织者是容闳。

#### 1. 容闳和派遣留学生计划

容闳(1828—1912年),字达萌,号纯甫,广东香山南屏镇(今属珠海市)人。1847年,他与同学黄宽、黄胜一起,随美国传教士布朗(Samuel Robbins Brown)夫妇赴美留学。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,成为近代第一位“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”的中国人。

容闳是一位爱国者。他在美国留学7年,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的同时,时刻惦记着祖国和人民。他为国家的腐败而痛心,为人民的痛苦而忧愤。他写道:“予当修业期内,中国之腐败情形,时触予怀,迨末年而尤甚。每一念及,辄为之怏怏不乐……更念中国国民,身受无限痛苦,无限压制。”<sup>①</sup>他立志要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“见诸实用”,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。经过多年酝酿,到大学第4学年时,他已把将来应行之事,“规画大略于胸中矣”。“予意以为予之一身,既受此文明之教育,则当使后予之人,亦享此同等之利益。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

<sup>①</sup>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,第22页。

境。”<sup>①</sup> 具体来说,即是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。

为了实现这个计划,造福于国家和人民,1854年11月13日,容闳不顾留在美国的种种“吸引力”,毅然踏上了归程。回国后,他曾做过多种尝试,历经挫折,但“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”的初衷不变。机会终于来了。1870年发生“天津教案”,曾国藩、丁日昌等奉命前往处理,容闳受命任译员。容闳抓住机会,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正式提出派遣学生赴美国留学的计划:

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洋留学,以为国家储蓄人才。派遣之法,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。此百二十人中,又分为四批,按年递派,每年派送三十人。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。学生年龄,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。视第一、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,则以后即永为定例,每年派出此数。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,庶幼年学生在美,仍可兼习汉文。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,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。此项留学经费,可于上海关税项下,提拨数成以充之。<sup>②</sup>

对于容闳的留学计划,曾国藩早在数年前已略有所知,再加上丁日昌对此又大为赞许,因此他很快表示同意,并领衔联名上奏清政府。容闳闻此消息,“乃喜而不寐,竟夜开眼如夜鹰,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,忘其为僵卧床第间”<sup>③</sup>。

1870年冬,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正式得到清政府批准。为了实施这个计划,曾国藩、李鸿章组织人员拟定了《挑选幼童赴泰西肄业章程》和《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》,分别在1871年9月3日和1872年2月27日上奏清政府。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文件,前者12条,后者6条,对于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关事宜作了具体规定。

<sup>① ② ③</sup>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,第23页,第86~87页,第90页。

主要内容有:(1)委派陈兰彬、容闳为留美学生正副委员(监督),经办一切留学事宜;(2)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,由刘翰清负责,经办挑选幼童、派送出国等事;(3)每年选送聪慧幼童30名前往美国留学,4年共派遣120名;(4)从上海、宁波、福建、广东等处挑选幼童年龄在12岁至16岁之间;(5)留学年限为15年,学成归国,听候派用,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,也不准私自先回自谋别业;(6)赴美幼童学习1年,如“气性顽劣”或“不服水土”,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,缺额在旧金山15岁左右的华人中募补;(7)幼童出洋后,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,课以《孝经》、小学、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,每遇房、虚、昴、星等日,正副委员传集幼童宣讲《圣谕广训》,每逢三大节及朔望等日,由驻洋委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幼童,望阙行礼;(8)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各项经费预算。

选派幼童赴美留学,招生是重要的一环。当时,社会风气未开,消息闭塞,国人对于外国的情况了解甚少,许多人甚至误以为那里“蛮夷遍地,将会剥掉孩子们的皮,再蒙上狗眼,把他们弄成罕见的动物去展览”<sup>①</sup>。再加上送幼童出洋留学,家长还必须在“甘结”上签名画押。下面是詹天佑父亲詹兴洪的“甘结”:

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。兹有子天佑,惟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;学习机艺回来之日,听从中国差遣,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;倘有疾病生死,各安天命。此结是实。

童男,詹天佑,年十二岁,身中,面圆白,徽州府婺源县人氏。  
曾祖父贤,祖世鸾,父兴洪。

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

詹兴洪(亲笔画押)<sup>②</sup>

<sup>①</sup> 李喜所:《近代中国的留学生》,人民出版社,1987年版,第26页。

<sup>②</sup> 徐启恒、李希泌:《詹天佑和中国铁路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8年版,第8页。

这份类似卖身契的“甘结”，使许多人疑虑重重，望而止步。即使像詹兴洪这样的开明人，也是在邻居好友的反复劝告下，并答应将自己的第四个女儿许配给詹天佑之后，才怀着沉痛的心情勉强在“甘结”上签字。由于报名者不多，容闳的招生工作困难重重。到 1871 年夏，第一批 30 名的定额还没有招满。不得已，“乃亲赴香港，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，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，以足其数”<sup>①</sup>。可见，冲破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1872 年 8 月 11 日，第一批 30 名幼童从上海登船赴美留学。随后，第二、三、四批各 30 人也分别于 1873 年、1874 年、1875 年相继成行。这 120 名幼童中，年龄最大的 16 岁，最小的 10 岁，十三四岁的占大多数。从籍贯上看，广东 84 人，占 70%；江苏 21 人，占 17.5%；浙江 8 人，占 6.7%；安徽 4 人，占 3.3%；福建 2 人，占 1.7%；山东 1 人，占 0.8%。而广东人中，又以香山最多，40 人，占 33.3%。<sup>②</sup> 这 120 名幼童，谱写了中国近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新篇章，掀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。

## 2. 幼童留美半途夭折

幼童们到达美国后，大体上按两人一组，分散寄居在美国居民家中。这种方式，既使幼童的生活得到照顾，同时也使他们融入美国社会中，十分有利于语言学习。过了语言关之后，他们便入当地的小学、中学肄业。中学毕业后，又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。由于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秀，他们中不少人进入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大学深造。中国留学生的勤奋好学、积极上进、礼貌谦虚，赢得了美国友好人士的赞誉。耶鲁大学校长朴德等在给总理衙门的联名信中称：

① 容闳：《西学东渐记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1 年版，第 93 页。

② 李喜所：《近代中国的留学生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7 年版，第 39 页。

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，自抵美以来，人人能善用其光阴，以研究学术。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，成绩极佳。即文学、品行、技术，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，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。论其道德，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。其礼貌之周至，持躬之谦抑，尤为外人所乐道。职是之故，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，或赴乡村游历，所至之处，咸受美人之欢迎，而引为良友。<sup>①</sup>

然而遗憾的是，幼童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学业，而于 1881 年被提前撤回。幼童留美半途夭折，留学事务所内部的顽固派的破坏固然是重要原因，但根本原因则是留美学生受到资本主义的“同化而渐改其故态”，而这些，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，都是不能接受的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赞成容闳的建议，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，其“初心”是为了“学习军政、船政、步算、制造诸学…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，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”<sup>②</sup>。同时，他们也担忧幼童“早岁出洋”，腹少经书，会“沾染洋习”。因此，在规章制度中，十分强调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封建礼仪的训练，加强对幼童的防范，使他们“不至囿于异学”。幼童出国后，他们又一再告诫：“出洋本意，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，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，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，规矩不可变更。”<sup>③</sup> 应该说，初到美国时，幼童们还是遵守规定的。他们每隔 3 个月到留美事务所学习“中学”，既学做“中学”作文，也练习小楷。星期天，寄居的主人带他们到教堂去，他们吓得惊慌失措，慌忙逃出教堂。然而时间一长，情形就不同了。他们“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，且习与美人交际，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。其一切言行举止，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……终日饱吸自由空气，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

① 容闳：《西学东渐记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1 年版，第 108 页。

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洋务运动》（2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1 年版，第 153 页。

③ 宋晞：《旅美论丛》，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，1968 年版，第 36 页。

重之压力,一旦排空飞去,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”<sup>①</sup>。谒见留学生监督,“均不行跪拜礼”。信教学生增多,有的已受洗为基督徒。洋务派担忧且严加防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。对于留学生的这些变化,在容闳看来,“皆必然之势,何足深怪”。但在顽固派眼里,是大逆不道,洋务派也认为“适异忘本”。在这个根本问题上,顽固派和洋务派走到了一起,而容闳则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。因此,李鸿章“不愿为学生援手,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”<sup>②</sup>。1881年6月8日,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决:“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。”<sup>③</sup>

此外,幼童留美夭折,也有国际背景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是有条约依据的。1868年签订的《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》(亦称《蒲安臣条约》)第七条规定:“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,学习各等文艺,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。”<sup>④</sup>可是,19世纪80年代,美国掀起反对华工的风潮,国会还通过了禁止华工的议案。1878年,容闳向美国政府提出,选送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进入美国陆海军学校学习,而遭到美国政府拒绝。这样,留美学生既不可能学到洋务派所期望的军政、船政之学,又所谓“沾染洋习”,再加上顽固派背着容闳,“日通消息于北京”,从中破坏,“留学事务所之运命,于是告终,更无术可以挽回矣”<sup>⑤</sup>。

### 3. 幼童留美的意义

派遣幼童赴美留学,虽然半途夭折,但其意义不可低估。

首先,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。近代以来,主张派遣学生出国留学,早就有人提出。如1863年,拣选知县桂文灿在给总理衙门奕訢的条陈中,建议效法日本派遣幼童出国留学。他写道:

<sup>① ②</sup>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,第102~103页,第107页。

<sup>③ ④</sup> 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洋务运动》(2)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61年版,第166页,第153页。

<sup>⑤</sup> 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,第107页。

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、美两国，学习制造船炮、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，期以十年而回。此事如确，日本必强，有明倭患，可为预虑。学习制造船炮等法，我国家亦宜行之。<sup>①</sup>

1865年，薛福成在《上曾侯相书》中也建议以俄国为例：

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，招后生之敏慧者，俾适各国，习其语言文字，考其学问机器。其杰出者，旌以爵赏。<sup>②</sup>

然而，直至幼童赴美留学，中国近代历史上才有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，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才从少数人的先进思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。因此，“挑选幼童出洋肄业，固属中华创始之举，抑亦古来未有之事。”<sup>③</sup>

其次，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。120名学生中，除因故已撤回和在美国病故者之外，其余94名，分3批回国。头批21名均入上海电报局，二、三批由福州船政局、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，其余50名分配到天津水师、机器、鱼雷、水雷、电报、医馆等处。这些学生中，2人已大学毕业，获得学士学位，其余则分别在大学、中学和小学肄业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学业尚未完成，但在美留学多则10年，少则也在5年以上，对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数十年以后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政界、军界、商界的重要人物，或者是工矿、铁路、建筑等部门的技术骨干。据统计，这批学生后来从事工矿、铁路、电报者30人，其中从事工矿者9人，工程师6人，铁路局长3人；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，其中大学校长2人；从事外交、行政者24人，其中领事、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，外交次长、公使2人，外交总长1人，内阁总理1人；经

<sup>①</sup> 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第611辑，台湾文海出版社，1973年版，第1549页。

<sup>②</sup> 丁凤麟、王欣之编：《薛福成选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23页。

<sup>③</sup> 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洋务运动》（2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1年版，第157页。

商者 7 人；从事海军者 20 人，其中海军将领 14 人。<sup>①</sup> 由此可见，这批留学生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第三，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积累了经验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，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初次尝试，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经验教训，为以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启示。派遣船政学生留欧，即是受到了幼童赴美留学的影响，同时，在留学生的年龄、外语要求、学识以及留学年限等重要问题上，显然是吸取了幼童留美的经验教训，作了重大改进。这是船政学生留欧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总之，幼童赴美留学，尽管筚路蓝缕，半途夭折，但毕竟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声。因此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## 二、派遣留欧学生

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起始阶段，前期的派遣国是美国，后期则是欧洲各国。1876 年，即最后一批 30 名留美幼童派遣完毕的翌年，清政府就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。至甲午战争前约 20 年间，先后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共 4 批，计 145 人。分别是：1876 年，李鸿章奏请派遣王得胜、卞长胜、朱跃彩、杨德明、袁雨春、查连标、刘芳圃等 7 人赴德国学习“陆军技艺”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德学生，也是最早一批陆军留学生。1877 年至 1896 年，以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为主体的船政留欧学生 4 届计 88 人。1892 年，张之洞奏准派译员俞忠沅携工匠 10 人至比利时学习炼钢技术。1896 年，张之洞又获准选派江南陆军学堂、铁路学堂、储材学堂的学生 40 人赴英、法、德 3 国留学。在上述 4 批留欧学生中，以船政的规模最大，准备最充分，组织管理最有成效，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。

<sup>①</sup> 李喜所：《近代中国的留学生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7 年版，第 65 页。